

# “科举地理学”：科举学研究中的显学

程 伟

**摘要：**“科举地理学”以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相对成熟的研究方法，在科举学体系中堪称一门专学或发展中的学科。作为科举学的一门特殊理论分支，因其研究资料的大量存世和研究成果的丰富广博，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性和现实性，使得“科举地理学”研究向来十分活跃，可以说是科举学研究中的显学。不过，当前“科举地理学”研究虽然十分活跃，但仍处于研究的专学阶段或曰草创时期。要使之真正成为科举学中的一门特殊理论学科，发挥其学科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尚需要学术界付出不懈的努力。

**关键词：**科举地理学；科举研究；科举学；显学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9)01-0097-04

**收稿日期：**2018-10-31

**基金项目：**天津市2017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天津市高考改革研究”(TJJXQN-17-002)；天津大学2018年度自主创新基金—社会影响力项目“基于量化数据库构建的清代河南举人群体研究”(2018XS-0038)。

**作者简介：**程伟(1984-)，男，河南商水人，教育学博士，天津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科学研究中心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科举史及科举学研究；天津 300354。

科举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专学、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一门发展中的学科，其研究范围十分广阔，研究内容也非常丰富。它既可以对科举制度和活动本身进行研究，也可以对与科举相关的外部环境的联系和影响进行研究<sup>[1](P24)</sup>。就其后者而言，科举与地理关系极为密切。科举作为一种历史客观存在，是在一定时空中产生、发展和完善的，所以必然会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换言之，对科举进行研究

离不开时间和空间，“时”与“地”是科举事实必要的元素，对科举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极大。科举制度产生于中国并采行于东亚其他国家，这并不是偶然，确实存在一定的地理文化因素。科举制度产生之后，反过来又对东亚各国的社会文化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由于科举与地理有着如此密切的互动关系，科举地理研究向来十分活跃。自20世纪20年代张耀翔对清代进士地理分布进行研究以来，现代意义上的科举研究渐自兴起<sup>[2-3]</sup>。之后，科举地理研究迅速发展，目前已然成为科举学研究中的显学。

## 一、研究对象独特而重要

科举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专学，随着研究的不断拓展与深入，正在日益发展为一门新的学科体系。在这个学科体系中，科举学的首创者刘海峰教授大致将其分为内学和外学两大范畴：内学或曰内部研究，是对科举制度和活动本身的研究，如科举制度的起源、科目的兴废、考试方式方法的演变、科第人物具体登科年代或事情的考证、科场案等，基本上属于较微观的研究；外学或曰外部研究，是对科举相关的外部环境的联系和影响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如科举与官僚政治的关系、科举与学校教育的关系、科举与文学的关系、科举与文化的关系、科举与社会流动的关系、科举对外国的影响等，基本上属于宏观的研究<sup>[1](P24)</sup>。显然“科举地理学”属于科举学的外学研究范畴。在这个外学研究范畴中，相对于科举学的其他外学分支学科或研究领域，“科举地理学”可谓是其中的一门显学。

之所以将“科举地理学”称之为科举学研究中的显学，是因为其研究对象独特而重要，研究方法相对成熟，堪称一门专学或发展中的学科。“科举地理学”作为科举学研究中的专门领域，不仅研究科举现象的地理分布、扩散和演变，以及科举活动的地域结构形成和发展规律，还探讨科举与地理

之间的交互关系。具体而言,“科举地理学”主要研究科举人才的地理分布状况,包括其演变发展的历史、分区定额录取制度的起因与形成、冒籍现象及其惩处等,以及科举与区域政治、经济、教育、人口和社会风俗等之间的关系<sup>[1] (P308)</sup>。因其研究对象是过去的历史陈迹,故研究旨在还原和示明特定地域的科举历史与事实。从这个角度上讲,“科举地理学”是一门历史性的“事实学科”,即强调研究的客观性,关注研究的科学价值,进行事实判断,摒弃价值判断。又因“科举地理学”是运用地理学(主要是人文地理学)的理论,认识与分析科举现象的地理分布特征和探讨区域科举制度与活动的运行规律,因此,它又是沟通科举学与地理学的一门中介学科,是一门日益形成的新兴学科。而且,作为历史学的一部分,“科举地理学”除拥有相对成熟的史学研究方法外,还具有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分析进行研究的属性。正是因为“科学地理学”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相对成熟的研究方法,决定了其不会仅停留在研究的专学阶段,未来或将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 二、研究资料量大而多样

“科举地理学”之所以能够成为科举学研究中的显学,不仅由于其研究对象独特而重要,研究方法相对成熟,还因其有着数量庞大且多样的研究资料。目前,仅从存世的各省科举人才文献资料上看,涉及进士、举人等科举人才的各地方志就有11 000种之多,分布于全国省、府、州、县等各级行政区<sup>[4] (P513)</sup>,并且有大量与举人直接相关的历代各省乡试录、乡试同年齿录、乡试同年便览、小录,以及可做分省区统计的历代进士登科录、进士同年齿录、进士履历便览、会试录、会试题名录、会试同年齿录、会试同年便览等科举录存世。据美国学者艾尔曼(B. A. Elman) 2000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的英文著作《帝制中国晚期的科举文化史》搜集统计,现存1148年至1904年间文科各类科举录达1 042种,其中,明清两代存世的各省乡试录分别为324种和623种,占总数的十分之九强<sup>[5]</sup>。尽管艾尔曼对现存科举录搜集已经相当丰富,但由于搜寻范围多限于世界著名大图书馆,基本上未包括中国大陆许多

大学图书馆和省市图书馆及民间的收藏,因而实际上还有不少科举录未包含在内<sup>[6]</sup>。比如,就清代河南乡试来看,据笔者统计,就有14科乡试录和6科乡试题名录,还有部分乡试同年齿录和乡试同年全录,并不在艾尔曼统计范围之内<sup>[7]</sup>。科举录的大量存世为开展区域内和区域间科名分布的比较研究,提供了较为丰富且可靠的样本资源。

此外,还存有不少武举乡试录和会试录、文举乡会试朱卷、闱墨,以及记载科举人物行为事迹的政书、类书、文集、笔记、族谱、小说、戏曲等科举文献资料。如1992年由台湾成文出版社出版的《清代朱卷集成》就收集8 000余份乡会试朱卷,其中乡试朱卷就有5 200多份。据刘海峰教授估算,不计重复的朱卷,各地现存的朱卷至少在15 000种以上<sup>[1] (P349)</sup>。这些乡会试朱卷上详细地记载试卷作者的三代履历、家世情况和师承关系,为考证科举人物的籍贯、族属、生年、师承,尤其是为研究科举家族与区域科第文风盛衰关系,社会阶层的纵向和横向流动提供了绝好的资料来源。

正因为科举地理文献资料的大量存世,才使得科举地理系统研究得以实现,同时也是“科举地理学”能够成为一门专学甚至一门新兴学科,并在科举学研究领域中一直保持活跃并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

## 三、研究成果丰富而广博

综上所述,“科举地理学”在科举学体系中占有突出地位,这不仅表现在拥有大量的存世文献资料上,还表现在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上。如前所述,早在20世纪20年代,张耀翔就开始运用科学的方法对清代进士的地理分布进行研究,之后,科举地理研究一直是科举学研究中的热点。这可以从目前已有的丰富研究成果中窥见一斑。迄今为止,已出版的科举地理研究专著或专书不下125部,已刊布的学术论文也有600多篇,并且呈现逐年增长趋势。从1993年起,每年都有科举地理研究著作出版发行。进入21世纪,科举地理研究著作增长尤为迅速。截至2017年,已出版的科举地理研究著作达100余部,平均每年出版这方面著作约6部。尤其是近十年来,平均每年出版科举地理研究著作不下9部,

约占整个科举研究著述的四分之一强；近五年年均发表科举地理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也不下40篇。就研究主题来看，主要有以下四大热点：

一是科举人才地域分布研究。在科举时代，科举人才地域分布数量的多寡往往成为衡量一个地区文风高下和教育水平高低的最基本、最客观的评价指标，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折射出各地的经济和文化教育发展水平。故此，这常常成为教育学、人文地理学、历史社会学等关注的研究领域。这方面研究可以说是科举地理研究热点中的热点，主要涉及状元、进士、解元、举人等科举人才地理分布的专题研究，尤其对进士和状元的研究则更为活跃，类似出版的《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明代福建进士研究》《清代四川进士征略》《清代江西进士丛考》《镇江进士研究》《苏州状元》《吴地状元》《福山明清举人传》等著述多达几十部。

二是直省乡试研究。自元代起开创了以行省为单位的乡试模式，明清两代因而袭之，五百多年间虽屡有损益，但作为科举考试层级中具有取士性质的一级考试，遂成为定制<sup>[8]</sup>。历元至清共有51个断代的省级乡试单位可供研究。目前仅有清代江西、福建、顺天、河南、贵州、山东、湖南七直省及元代江浙行省乡试研究，还未有学者对明代乡试进行过系统探讨。其中前五省乡试研究成果已有博士论文问世，研究最为深入系统。乡试是一省范围内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考试，对地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风俗等方面具有重要而广泛影响，加之现今存世的文献典籍较为丰富，元明清三代多数乡试单位多数未被系统研究。因此，可以预见直省乡试研究未来必将成为科举地理研究最为活跃的主题。

三是省区科举专题研究。目前主要涉及直隶、北京、广西、福建、云南、台湾、杭州、苏州、桐城、泉州、临安等省区科举的整体研究，如《清代直隶科举研究》《北京科举地理：金榜题名的历史遗迹》《云南古代举士》等，以及一些直省科举考试史研究，已出版《河南考试史》《广西考试史》《江西考试史》《云南考试史》四直省考试专史。这方面的研究空间还很大，若是加以拓展和深化，所出丛书远不止几十部。

四是科举地理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目前已出版

30多部有关科举地理文献的著述，主要涉及区域进士题名录、状元题名录和乡会试朱卷等科举文献的整理与辑录。其中以区域进士题名录的整理与辑录最为活跃，现已出版《明代浙江进士录》《闽侯进士录》《吉安历代进士录》《临清进士辑录》《清代甘肃进士传记资料辑录》《台湾科举史料汇编》等著述十余部。由于各类科举地理文献资料的大量存世，可以预见未来这方面的研究还将进一步拓展。

#### 四、具有重要的学术性和现实性

“科举地理学”之所以能够成为科举学研究中的显学，还在于其研究本身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承前所述，“科举地理学”作为一门历史性的“事实学科”，旨在从人文地理学的学科视角还原和示明特定地域的科举历史与事实，强调科举人才在不同时空的地理分布，关注科举这一社会资源分配方式对各地发展的重要影响，揭示科举人才与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资源双向互动、彼此影响的复杂关系，进而深刻认识与分析科举现象的地理分布特征和探讨区域科举制度与活动的运行规律<sup>[4] (P514)</sup>。“科举地理学”作为科举学与地理学的一门中介学科或交叉学科，对此进行深入研究不但有助于充实区域科举史、考试史和教育史研究，从而丰富和完善科举学、教育学和历史学等研究领域，使之走向深入和系统，而且作为科举学的特殊理论学科，从人文地理学的学科视角对古代科举地理现象和问题进行专门研究，还可以更好统合以往分散而琐碎的科举地理研究，推动科举学走向更高的研究水平，使得科举学研究日益走向综合化与理论化。

“科举地理学”作为一门历史性的“事实学科”，关注的研究对象虽然是已经过去的历史陈述，但科举考试的历史事实并未消失，还在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社会之中。现实社会中的许多考试涉及的区域问题与科举时代具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因此，从“科举地理学”的视角对考试区域问题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方面是传承文化，传承文明，即通过对省区科举历史的系统考察，可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当时当地文化教育的历史面貌，传承区域文

化,让这份丰厚的遗产充分发挥塑造民族精神的作用,增强不同地域人的归属感和自豪感,以及外界对不同区域的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是去粗取精,古为今用,即通过“科举地理学”研究让古老的科举制度在现实的中国重放异彩,为现实社会提供足资借鉴的资源。比如,通过研究古代科第文风的地域差异及其成因,探讨由此产生的科举考试分区定额录取制度的演化机制和发展规律,以及在调控古代区域间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不平衡中所发挥作用,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当今高考分省定额录取制度的历史渊源和合理价值,以及考试公平和区域公平的复杂矛盾关系。又如,通过研究古代科举冒籍现象产生缘由及社会影响、治理机制与治理效果,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和理解当代“高考移民”,以及“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异地高考”问题,并为治理和解决上述问题提供某些历史借鉴。

## 五、结语

“科举地理学”以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相对成熟的研究方法,在科举学体系中堪称一门专学或发展中的学科。作为科举学中的一门特殊理论学科,“科举地理学”对科举学的发展和完善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其研究资料的大量存世和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使得科举地理研究向来十分活跃,目前可以说是科举学研究中的显学。

但总的来说,当前“科举地理学”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研究中还存在史料整理与科学研究、专题研究与理论探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等方面

的缺陷。而最大的缺陷,莫过于多数研究并未体现“科举地理学”的独特视角。研究多为史料的整理与考证、史实的叙述或专题性的研究,缺乏自觉运用“科举地理学”的视角进行理论分析,尤其缺乏科举与地理交互关系的探讨与分析。以往的研究多数与其说是“科举地理学”,不如说仍然是科举学或科举学的地域研究。不可否认,当前“科举地理学”研究虽然十分活跃但仍处于研究的专学阶段或曰草创时期。故此,如欲真正使之成为科举学中的一门特殊理论学科,发挥其学科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尚需要学术界付出不懈的努力。如是,“科举地理学”才能成为科举学研究中名副其实的显学。

## 参考文献

- [1] 刘海峰. 科举学导论[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 [2] 张耀翔. 清代进士之地理分布[J]. 心理, 1926(01).
- [3] 刘海峰. “科举学”的世纪回顾[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03): 15.
- [4] 李立峰. 科举学的文化地理视角[A]. 刘海峰. 科举制的终结与科举学的兴起[C].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513.
- [5] Benjamin A.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627-640.
- [6] 刘海峰. 中国科举文化[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10: 488.
- [7] 程伟. 20世纪以来乡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历史档案, 2018(01): 144.
- [8] 汪维真. 明代乡试解额制度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16-17.

(责任编辑 陈剑光)

(下转第127页)